

《先行一步： 改革中的广东》梗概

〔美〕傅高义著 凌可丰 丁安华译

编前语：解开改革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之谜的关键是解开广东之谜。1978年，广东从文化大革命的满目疮痍中步履蹒跚地站了起来，然后仿佛一夜之间变成了人富地肥的经济大省。广东人是怎样做的？天时、地利、人和？这里我们梗概介绍美国社会学家傅高义先生《先行一步：改革中的广东》，以期大家了解一些广东的具体做法。

第一部分 变革之风

广东某县委书记问道：“我该怎么对我的孩子们解释，在文化大革命中发生过什么事情？”当他年满20岁，从部队转业回乡，在县里当上干部时，文化大革命爆发了。当红卫兵开始冲击当权派时，起初他因保护一些上级领导而受到批判。在问题查清之后，他被选进领导该县的军管核心小组，成为该组少数文职干部之一。他补充说，“对所发生的一切，我自己都难以相信，也难以理解：我们怎么能够犯这样的错误。”

1966到1976年期间，与其他国家相比，中国的青年与外部广阔世界的接触要少得多。对于红卫兵的目标，大多数人毫无明确的概念。广东的青年热切地寻找来自北方的红卫兵，因为北方来客对未来的发展掌握着更可靠的消息。中学和大学都建立了自己的红卫兵组织，然后与当地以及全国和同派组织联合起来。

《先行一步：改革中的广东》全书35万字。广东人民出版社在出版说明中写道：这本书阐述了广东改革的动因、性质、过程，又分析了广东不同地区在改革中的不同变化与进程。当然，傅高义先生作为一名外国学者，他的观点、思维方法，以及遣词用句等与我们的有所不同。这些都是不言而喻的，相信读者自会鉴别。

广东居民们非常害怕从外省来的那些红卫兵，因为他们不受本地的人际关系所约束。一般居民处处谨言慎行，就像他们在20年代和30年代军阀混战时期、抗日战争时期、国共两党内战时期那样。居民一般不远离住所，用木板顶住大门，避免晚上外出。即使在白天，活动范围也只限于上班和购买必需品。农村的人则如1949年以前发生动乱的时期那样，组织自卫队来保护自己，以防受到串连的红卫兵攻击或者暴徒趁乱抢劫。

在工作单位，由于总有人不断被批斗，而且许多有专业知识的人在1967年元月之后被调离，工作处于极端混乱状态，甚至完全停顿。根本不可能实施长期计划，甚至1966—1967年的年度计划也未能执行。没有人制订1966—1967年的跨年度计划，而在制订1971年开始执行的第四个五年计划时，也没有经过详细的审核程序。

省革命委员会将党组织结合在一起，其下设政治工作组负责政治工作。省计划委员会、经济委员会、科

学技术委员会和农业委员会都合并到一个生产组。1967年后，生产组试图制订一个年度计划，以保证解决他们遇到的问题。但由于供应上的混乱，他们只能把力量集中在最基本的物资上，努力维持最低限度的生产和分配。

70年代初期的农村政策是谨慎保守的，局限于生产足够的稻谷以防发生饥荒。由于自留地极其有限，自由市场则受到极严格的控制，有些地区甚至完全禁止。价格受到严格控制，产品质量差而且品种少。猪肉、鸡、鱼、猪的供应量，每人每月只有几两。农民不能私自出售产品，只从集体领取工分，其收入直线下降。“以粮为纲”基本上杜绝了饥荒，不致重蹈大跃进时期的覆辙。但经验告诫人们：市场是何等的重要！

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，新领导班子需要两年时间来巩固权力，准备改革。当时的形势比1952年共产党政府刚开始社会主义建设时在各方面都好得多。据广东省的统计资料，广东省1978年的人均收入是1952年的4倍，而自1952年以来零售价指数只上涨了15%。在此期间，广东已形成了有力的政治结构，已能够管理农村生产，为90%的青少年提供基础教育、提供公费医疗、开展计划生育，并建立了初步的福利网。已建成的公路和铁路，足以保证省内的粮食分配。建成了一个大重工业基地，包括几个主要矿山、钢铁厂、化工厂、机械厂和橡胶厂。

文化大革命造成了无法估量的巨大损失。最大的代价并非来自建筑物、工厂和运输设施的物质损坏。有些建筑物、铁路已被破坏，许多历史建筑和遗址被弄得面目全非。但是这类破坏对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影响不大。关心未来发展的官员也不认为，失掉发展生产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机会是文化大革命的最大损失。

对基础建设的忽视，才是更为严重的问题。工厂、商店和经济机构面临着许多问题：如供应不足、能源短缺、人员流失以及政治压力，人们只能集中精力应付燃眉之急。在动荡的10年中，广东在全国并不受重视。1960年中苏分裂以及对越战争时期，由于担心沿海地区易受攻击，广东的处境就更艰难。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，广东作为最易暴露的前沿，不仅得不到新的投资，而且部分工厂被迫内迁——一部分迁往其他省份，部分从广州迁往设备和人员素质都较差的韶关地区。基础建设的问题不仅存在物质方面，也存在于组织方面。由于供应短缺，工厂动用于日后需要而储备的库存，但却经常不向上级汇报，因为完不成生产指标要比谎报冒更大的风险。

然而，文化大革命真正的最大损失，是在人力资源方面。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”在1966年以前便遭到批判，而文化大革命又把批判更升一级。由于多年饱受的精神压力，当他们重获解放时，热情却已枯竭。大多数人冷漠、心有余悸，只求像人一样生活，能探亲访友。他们得到的物质补偿比象征性的所多无几，但也聊以自慰。他们力图避开危险，而社会生活看来到处都有危险。但是，谁能代替他们呢？

要使中国重新走上轨道并不容易。例如，在工作单位里，人们很同情那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挨整的人和行将退休而10多年来未曾提升过工资的老年人。但挨整的不一定都是好职工，对他们的同情反而难以保证工作的

高标准要求。“十年动乱”中，盛行的工作态度是：混日子、逃避责任、不干或少干、缺乏主动性，尽可能索取特权，利用一切影响为亲戚朋友谋工作。在文化大革命后，干部和工厂厂长们力图重新组织工作，但他们发现档案混乱，职工的政治问题需要处理。文化大革命中相互的恩怨和对立情绪尚未消除，人们过去响应号召作出牺牲的时间太长了。1978年以后，他们所关心的是工资和物质好处。外省人一向认为广东人只是追求物质享受，但在50年代，广东人也曾响应过无私工作的号召，遵守建国初期的严明纪律。广东人现在和其他地区的人一样，坚持先看到物质利益，再谈奉献。从最好的方面来考虑，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重新建立工作的自豪感和纪律性，然后才能谈到责任心、效率和劳动生产率。

1957年集体化运动之后，一些中国领导人提出了“社会主义改造走得太快了”的异议。在大跃进失败后，到1961年，这些人的影响力已发展到足以进行适度体制改革的地步。在文化大革命中，中国体制的弊端暴露无遗，以致各地要求变革的呼声愈加强烈，包括共产党领导机构在内。邓小平早在1977年8月8日的一次谈话中，就提到体制改革的必要性。在1978年12月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，他已身居推动改革的要职。虽然许多问题尚待解决，但在1966年之前就曾提出过、却未能成为主导思想的一些基本观念，已赢得了广泛的支持。这些观念是：

——立即采取措施，改善人民生活。人民受苦太多，“主义”谈得太多，中国必须找到适合国情的东西。

——过多的计划使经济失去活力，削弱了发展动力。市场必须复苏，并使之繁荣，以便活跃生产，满足人民的需要。

——要保护人们免遭飞来横祸。而且，知识分子和专家是爱国的，应受礼遇。中国的专家实在太少，极需他们的帮助。

——不应违反其意愿强迫城镇青年留在农村，应允许人民有发表意见和旅行的自由，读其所欲读，看其所欲看。

——党必须更多地注意行之有效的政策。在提拔人才上，应更多地偏重其能力、表现，而不应只看其政治态度。

——中国需要扩大与外国的接触，尤其需要扩大对外贸易，学习外国的技术和经验。对广东来说，这就意味着向香港打开大门。

文化大革命后改革的思想已呈现出不可遏止之势。过去的10年灾难如此深重，许多人不仅为死去的同志和亲友哭泣，也为中国的命运洒泪。广东省一位前副省长的一番话得到了大家的共鸣。他说：“我们必须感谢文化大革命。没有它，我们也许永远不会进行这场根本性的变革。文化大革命使我们认识到旧体制的弱点。从长远来看，正是具有了文化大革命，中国才会变得更美好。”□

傅高义，1930年7月出生，1950年毕业于俄亥俄州韦斯利大学。1958年获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。曾撰有《日本第一》、《日本的中产阶级》、《重整旗鼓——重建美国实例分析》等著作。70年代始，对我国广东社会经济情况进行考察和研究。撰有《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东：一个省会的规划和政治（1949—1968年）》。本刊介绍的《先行一步：改革中的广东》，是傅高义先生应广东省政府邀请，进行7个月实地考察研究的成果。作者还拟在若干年后，再写一本关于90年代广东的续集。后者作者将重点介绍香港回归后的粤港经济区的发展情况。